

张有隽

人类学民族学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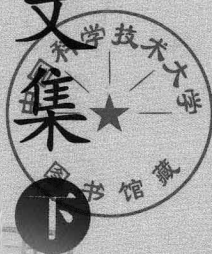
下

张有隽 著

民族出版社

张有雱

人类学民族学文集



张有雱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有隽人类学民族学文集/张有隽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1. 2

ISBN 978-7-105-11393-4

I. ①张… II. ①张… III. ①人类学—文集②民族学—
文集 IV. ①Q98-53②C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6180 号

策划编辑: 虞 农

责任编辑: 毛乐燕

封面设计: 孟 龙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cbs.com>

排 版: 北京万珩兴文化发展中心

印 刷: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110 千字

印 张: 38.5

定 价: 98.00 元

ISBN 978-7-105-11393-4/C · 321 (汉 283)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 010-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64224782)

经济人类学的理论范式^①

经济人类学是人文与社会科学中最具边缘性、交叉性的一门学科。其多元的理论构架，不仅是直接回应人类学与经济学原有理论体系的一个产物，而且还包容了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知识。

经济人类学理论的主要思想来源，除了本体学科人类学外，还可追溯到古典微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三大学科领域。不同的理论源流和学术传统，使经济人类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形式主义、实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广义四大学派^②，以及形式模式、功能模式、制度模式等相应的理论范式。不同的学派和不同理论范式，都表现出自身的潜能和局限。它们都与某种理论有承接关系，但并不意味着不同的理论范式专属某一学派。在经济人类学中，不同的理论范式在不同的学派中存在着互渗互用的情境。本文试就国内外学者对功能主义等三种理论范式研究做一评介。

一、功能主义理论范式

功能主义的理论范式是英国社会人类学大师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1881—1955年）所创立，但渊源却可以追溯到社会学的功能分析。法国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埃米尔·迪尔凯姆

① 本文收入《中国与东南亚民族论坛论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② 有人将经济人类学划分为功能主义、形式主义、实体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四大学派，笔者这里采用施琳博士的四分法，不把功能主义当作经济人类学一个流派，但当作一种理论模式是可以的。

(1858—1917年)建立的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理论体系,认为社会现象有两个特征:一是客观性,它是事实上存在的现象;二是社会性,即人们的行为方式有社会性质,它存在于个人意识之外。社会现象具有强制性,通过法律、道德、风俗习惯、经济组织等团体作用于个人。要完整地解释社会现象,首先要找出事物产生的原因^①,然后研究事物的功能。而功能研究的出发点,便是要找出各种制度、组织和信仰之间的关联性,使其与社会整体的某种需求取得一致,以强调社会的规范、稳定与团结,这便是迪尔凯姆社会学的功能观。^②

源于迪尔凯姆的功能分析,经由马林诺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引入人类学。这两位人类学家都把社会与文化看作是一个具有整体功能的系统,认为系统的每一部分必须按它置身其间的总体结构来理解。而功能主义在经济人类学中的运用,也是由马林诺斯基对西太平洋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居民的经济生活的描述开启的。我们知道,马林诺斯基在其对库拉制度的研究中,并未把指导市场行为的功利主义目的的“理性个人”和“最大化”原则引为判断的标准,而是着力考察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居民在库拉交易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库拉交易如何把群岛居民联合起来,它在发挥带动日常用品交易的经济功能的同时,亦在发挥增强和保护已经出现的阶层结构,巩固阶层等级制度的功能。^③

功能主义理论范式的特点,是它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制度与信仰之间的相互联系、整体社会文化系统的维持与稳定上。它“特

① 迪尔凯姆认为,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是社会环境的内部,而不是社会环境的外部,他说:“一切社会过程的最初起源都必须从社会内部环境的构成中寻找。”

② [法]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③ 陈庆德:《经济人类学》,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别喜欢向人们表明，社会的表层性经济制度如何通过亲属制度或宗教信仰制度而得以建构，仪式系统如何促生产、如何组织政治行动，宗教迷信为何不是天方夜谭而是调控社会关系的宪章”^①。在进化论思潮尚居于学术界主流地位的年代，这种功能主义的理论范式犹如给人们吹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对经济人类学以致整个人类学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马林诺斯基之后的经济人类学众多学者中，无论形式主义者、实在主义者或新马克思主义者，无一不在自己的研究中，参用了功能分析方法。迪尔凯姆的传人马塞尔·莫斯（1872—1950年）在马林诺斯基影响下于1925年著成出版的《礼物论》，对礼物交换在社会秩序中的功能做出系统分析，提出了社会交换的理论。马林诺斯基的大弟子雷蒙德·弗士（1901—2002年）于1929年出版的《新西兰毛利人的原始经济》、1936年出版的《我们：提科皮亚人》，强调对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结构的综合功能分析。卡尔·波朗尼在马林诺斯基、弗士启发下，比较原始的、古代的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异而于1944年出版的《伟大的转变》，1957年出版的《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阐述了经济是嵌合在社会制度中的理论观点及社会整合模式。上述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都打上了功能主义分析的烙印。

功能主义理论范式也有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它把一个社会或文化单位当作一个孤立的、封闭的、静态的、整合良好的系统，从而导致一种反历史的倾向；过分强调社会习俗的功能因素，而忽略它们可能暗含的机能障碍，使社会变迁的研究成为这一理论系统中最薄弱的一环。马林诺斯基为此而遭到其他人类学家的质疑与批评。他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他后期对非洲的研究中，提出了“文化动态论”的观点和研究文化变迁的ABC

① [美] 乔治·F·马尔库斯·米切尔、M.J. 费彻尔，王铭铭译：《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50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

“三项法”，修正了自己的理论。^① 现代经济人类学家在运用功能分析方法做研究的时候，都抛弃了静态平衡的观点，而注意社会或文化系统各部分在动态过程中如何经历不平衡、冲突，最后达到新的文化整合。

二、形式主义理论范式

经济人类学中的形式主义理论范式是弗士、赫兹克维茨创立起来的，但其渊源可溯至西方古典微观经济学。18 世纪下半期，英国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产业革命，亚当·斯密（1723—1790 年）在这一时期创立了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斯密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对自然秩序的信仰。斯密认为：如果没有人为的限制，人类的自然倾向会形成事物的秩序。互相交易是人类特有和共有的倾向。为了说明靠利己心激发的交换过程，斯密把利己的“经济人”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并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论点，认为在以资本牟利的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根据他的经济理论和他对“看不见的手”的信仰，斯密主张取消国家对国际贸易的一切管制和干预，废除对自由运用资本赢利的任何限制。因此，斯密经济理论的核心是经济自由主义。^② 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围绕经济增长的动力和规律这一主题，全面论述了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兼及货币、商业、财政、经济史、经济思想等，奠定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斯密之后，英国的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6 年）提出了“人口增长有快于生活资料增长的趋势”的“人口论”和“土地

^① 费孝通：《读马林诺斯基及文化动态论》，见马戎、周星：《二十一世纪：文化自学与跨越文化对话》，126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② 余永定：《西方经济学》（第三版），785～788 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收益递减规律”^①；法国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年）提出“供给不可能普遍大于需求”的“萨伊定律”；而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系统阐述了他的价值论、分配论、国际贸易理论和税收理论，把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的体系。19世纪四五十年代，古典经济学因不能解释现实生活而受到质疑与批评，经历危机导致其崩溃。到19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依据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而发展出边际主义的经济理论^②，形成现代西方经济学，又称“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视“资源稀缺性”、“效用最大化”、“理性个人”等概念为核心分析工具。英国经济学家昂内尔·罗宾斯夫人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学科”，被视为现代经济学的经典定义。

从某种程度上说，“形式主义”这一称呼是波朗尼对应“实在主义”的称呼而赋予的。而波朗尼提出“形式主义”与“实在主义”这一对应称呼时，蕴涵着最深层的对历史认识论的区分。^③就西方经济学而言，尽管在其创立过程中有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分，然而，无论新、旧古典经济学，它们都以个人私利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这一哲学基础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在方法论上都运用假设前提、逻辑演绎的分析方法也是完全一致的。假设前提、逻辑演绎的方法属于典型的形式主义逻辑方法。因而波朗尼赋予其“形式主义”的称呼是十分恰当的。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经由弗士、赫兹克维茨引入经济人类学。弗士认为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在一般意义上是有效的，可以借鉴来分

① 在富裕国家中，随着家业生产成本的提高，土地收益呈递减趋势。

② 英国哲学家耶利米·边沁（1748—1832年）强调人类行为完全以快乐和痛苦为动机，认为私利是人类行为的动机，人类永远追求个人幸福。而社会为个人的总和，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只要人人都追求个人幸福，社会自然就会进步。边沁的这种哲学成了以后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基础。

③ 陈庆德：《经济人类学》，1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析前资本主义状态下的经济行为与制度。他于1939年发表的《原始波利尼西亚经济》，就借用了西方经济学中的资本、财富、分配、交换、劳动力、价值等概念性工具来描述与解释提科皮亚人的经济行为，并得出结论说，无论在何种社会形态下，人们想以尽量少的投入获取最多产出的心理是相似的。赫兹克维茨于1940年出版的《原始人的经济生活》，尝试按照西方经济学的传统范畴来分析人类学田野资料。他认为物品具有稀缺性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现象。在物品稀缺性的问题上，不同社会（无论规模大小，简单抑或复杂，开放还是封闭）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而不是根本类别上的差异。因此，以最少投入获取最大产出的经济最大化原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起作用的。在弗士、赫兹克维茨的倡导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形成了经济人类学中的形式主义理论范式。

经济人类学的形式主义理论范式的基本特点，是将西方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原理作为自己方法论的指导原则，聚焦于边际效用分析，借用传统经济学的概念和假说为发端，理论的中心概念是价格、供给—需求、稀少性、最大化假定，以及个人兴趣选择首要性等范畴。从个体行为描述开始，直接引入经济学母体的许多分析模型，诸如决策模型、适度征集模型、中心地模型等等。而最大化和均衡两大概念，则是作为其系统模型的主要结构性支柱。^①

弗士、赫兹克维茨等形式论者的目的是要确立人类学与经济学的联姻。尽管他们的观点遭到实在主义者的尖锐批评，形式主义对经济学理论的搬用，并不仅仅是消极意义的。人类学的社会与文化分析角度与经济学模式结合构建起来的经济人类学形式主义理论范式，不但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个性，而且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

一方面，形式主义理论范式把经济学概念引入经济人类学领域，对丰富和深化人类学研究内容有积极的意义。生产要素分析、

① 陈庆德：《经济人类学》，1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经济发展原动力分析、要素效用的关联性、机会成本等概念普遍在人类学著作中频频出现^①，并运用这些概念对人类学中的具体事实做出有创意的分析。如弗士、贝尔特、斯内德尔、芬尼、艾奇逊等人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品都广泛运用机会成本概念。贝内特在对北美北部平原居民的研究中，用这一概念解释大牧场主、农场主、印第安人、赫特里特人向劳动市场运动的可变率；斯内德尔以东非的个案说明，较富裕的牧民不愿进入欧洲人的经济活动，是因为他们不仅害怕失去在本土体制中已获得的财富，还害怕失去农场主地位，这意味着地位也像财富一样，有与它相关的机会成本。艾奇逊针对福斯特关于农民因商品概念有限而抵制变化的假设，指出是机会的缺乏而不是商品概念的缺乏，造成了农民发展的障碍。有学者指出，显而易见，与固守文化传统的一般解释相比，机会成本的概念对抵制变化或响应变化的现象所做的解释更为深刻。^②

另一方面，形式主义理论范式在经济人类学中的运用，也对经济学体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积极意义。首先，形式主义理论范式对西方经济学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如经济学一个传统观点是：非西方经济中存在劳动剩余和资本短缺（著名的罗斯托模式就持此说），其结论是，只要有新的资本输入，经济发展就注入了活力。而格尔兹、爱泼斯坦在印尼爪哇等地所做的人类学研究却证明，劳动力短缺才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障碍，因为普通劳动力是非技术性的和低效的，而生产的发展却需要越来越多的技术劳动力。又如，传统经济学认为，人口增长来自于随技术革新而扩大生产的新机遇，而博斯罗帕根据边际分析逻辑论证，却得出了人口增长促

① 机会成本：西方经济学认为，人们一旦决定运用有限资源来从事某项活动，就必须放弃运用这些资源从事其他活动的可能性，例如你决定用假日加班，就必须放弃用假日旅游的机会，这就是经济学著名的“机会成本”概念。

② 陈庆德：《经济人类学》，124～12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进了技术革新的结论。她指出,当人口增长时,为了保证对食物增长的需求,农民就必须进行技术革新(我国近现代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上述挑战的实质意义是,提出了使经济学理论适应特殊情况的问题,以及经济学家需发展自己跨文化理论的必要性。^①其次,形式主义在广泛运用经济学概念的过程中,也把一些原来为人类学所密切关心的问题,置于更为广阔的公共话语空间,引起了经济学和其他领域的人们关注。^②20世纪60年代初期,哈根就曾致力于从人类学汲取有关内容,发展了他的经济变化理论。博尔廷认为不应把经济发展简单地建立在创造剩余价值的基础上,而应视为新的工具、习俗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即知识的总体变化。

形式主义理论范式也有缺陷。其缺陷出自这一理论范式是搬用西方经济学原理构建起来的。而西方经济学以利己的“经济人”的哲学宇宙观为基础建立的各种假说,从社会和文化背景上看,它反映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们相互关系的准则;从方法论上看,它主要靠数理推算和逻辑演绎方法建构分析模型,预测理想经济手段以求达到最佳的经济效果。这种假说即使在资本主义市场中也不能回答每一种经济与社会现实,因为假说终归是假说,而市场是千变万化的。事实证明,西方经济学的许多原理解答不了西方现实中的经济问题,正因为如此,才有古典经济学的崩溃、新古典经济学产生后“经济学是硬科学吗”之类的争论。但是,西方经济学家们却一直把经济学看成是一门普世性的硬科学。

毋庸置疑,经济人类学的形式主义学派,或许接受了波朗尼对经济的形式定义和赋予它的分析意义。而形式主义的理论缺陷,也正是从形式的“普同性”涵义中衍生出来的。^③

从弗士、赫兹克维茨到库克、斯内德尔,几乎所有形式论者都

① 陈庆德:《经济人类学》,125~1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② 陈庆德:《经济人类学》,1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③ 陈庆德:《经济人类学》,1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认同经济人类学的形式分析，应以稀缺性是所有社会生活中的事实起点。弗士说：“……稀缺性的逻辑作用于经济现象的所有方面，无论社会因素的影响有多么深刻和复杂，经济概念与经济的概念根本上是不能分离的。”^① 赫兹克维茨说：“商品的稀缺性，是人类经验中的一个普遍事实”，“无论其群体是大是小，也无论其经济系统的机制简单复杂，这都是千真万确的。”^② 库克认为，如果经济人类学家不能把边际概念用于所有的文化，他们便放弃了归纳的（即科学的）方法。斯内德尔则把昂内尔·罗宾斯夫人的经济定义（经济学是研究稀缺性资源有效配置的科学）引为“形式主义经济学最为厚爱”的一个定义。^③ 对形式主义者来说，正如在其之前的边际主义者一样，为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而进行理性计算，乃根植于人的本性的普同性行为。如果我们接受这些假说，那么边际经济学就不是一个为资本主义经济而设计的理论，而是一个可用于任何社会的经济体系的普同性理论。正是形式主义者对社会与文化差异的误判造成其理论上的缺陷。而普同性假说的深层蕴含着一种民族中心主义论调，或如普莱特纳所说的，隐含西方倾向。^④ 企图将依据一种特殊经济类型研究提出的基本假设，当作一种普世理论推广适用到世界上许多不同类型的社会，肯定会冒风险。所以，实在主义学派

① 弗士：《（经济人类学的主题）导言》，69页，见 Halperin. R. H., *Economies across Cultures: Towards a Comparative Science of the Econom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8.

② Herskovits, M. J. 1952. *Economic Anthropology: A Study in Comparative*, 17—18,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③ Cook, S. 1966. *The Obsolete "Anti-Market" Mentality: A Critique of the Substantivist Approach to Economic Anthropology*, 326,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Schneider, H. K. 1974. *Economic Man: The Anthropology of Economics*, 17, New York: Free Press.

④ 陈庆德：《经济人类学》，128～1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施琳：《经济人类学》，206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对形式主义学派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事实证明，尽管形式主义者对经济人类学研究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但是他们关于资源稀缺是世界性问题的论点，至今仍停留在假说上，并未得到充分的证明。

经过 20 世纪 60 年代的争论后，形式主义者开始发现自己的理论缺陷而进行修补。例如，著名的形式主义者列克莱尔就曾著文承认弗士、赫兹克维茨建立的形式主义研究模式尚未完善，主张予以修订、改良。进入七八十年代后，形式论者逐渐向广义、综合方向发展，放弃了构建普同性理论的努力，而专注于一些具体分析模型的建构，尤其是促进量化分析过程。如李、贝廷格、珀尔曼、史密斯、马丁、卡什丹等人于 1979—1983 年期间提出的“适度征集策略模型”与“生态模型”^①；霍尔珀林 1988 年归纳的“原子式形式模型”（以自主的个体决策者为分析单位）、“过程式形式模型”（处理超越个体单位，关联于生态和政治过程）。^② 在表象上，这些模型依然显现为经济人类学老形式主义者的一种细微转换的变体。作为普同性解释的形式主义和作为分析方法的形式模型，依然是以人的经济性为两者的显著特征。但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在于，在形式模型中，人的经济性只作为一个理想性要素起作用，而不是像 60 年代形式主义概念中的普通性要素；在这样的框架中，人们可以假定许多可计量的与现实相对立的不同理想。这表明，只要摒除形式理论的普同性或种族中心主义的假说，或者说，不是把它用于阐释的预测和描述，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它获得了一种方法存在的合理性。^③

三、制度分析理论范式

重视从制度角度分析与解释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制度，是波

① 陈庆德：《经济人类学》，13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② 陈庆德：《经济人类学》，19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③ 陈庆德：《经济人类学》，137～13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朗尼实在主义学派和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共有的特点，我们称之为制度分析理论范式。当然，经济人类学中的实在主义学派和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虽然共享制度分析的理论范式，但二者对经济所作的制度分析和解释仍有一定差异。关于这点，将在下面讲到。

制度分析源出于马克思。不仅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直接继承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就是波朗尼学派的创建者波朗尼本人也深受马克思理论的熏陶。

波朗尼 1886 年出生于匈牙利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期间学的是法律和哲学，一战期间曾任骑兵部队军官。1922—1924 年在“红色维也纳”任《奥地利经济》杂志的外文编辑。一战后的德国和中欧知识界，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虽为大学中的官方所否定，却是可用于分析急迫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理论。波朗尼的妻子 1919—1922 年期间是匈牙利共产党员，波朗尼本人于 1933 年逃离法西斯主义和反犹太主义迫害而移民英国，其间与英国社会主义者极为亲近，他的经历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我们知道，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社会理论家、思想家、学者和革命家。在马克思的学说中，经济与社会、政治及意识形态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人类一切知识成果后，从劳动、资本、剩余价值入手，通过深入剖析资本主义运行规律，总结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有一段经典性的论述：

“人类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既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也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各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

桔，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就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①

这段话是马克思对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炼概括。马克思还有一句名言：“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称。”这句话可以解释为，人是社会的产物，人一生的行为要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而按照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人在生活和生产活动中结成的经济关系的总和即社会经济结构，是决定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因此，人要生存必须处理好两种关系，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次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波朗尼显然受到马克思的深刻影响。他提出的经济“实在”涵义源于人对自然及他人的依赖关系，所表达的是人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交换。而他关于“经济被嵌合在社会之中”（其另一种说法是“人的经济活动总是被淹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中”）的著名论点，其涵义不仅是说，人类社会生活的各种要素错综复杂地交织于一体，也意味着，在由这些制度性存在所决定的人类学行为中，实际上潜伏着财物的生产、分配等经济功能^②。因此，波朗尼力图从人与自然及他人的关系来考察经济，即从制度角度研究经济。波朗尼与马克思有一种潜在的一致性，他们共享一个制度模式。

经济人类学中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法国学派、美国学派研究的内容各有侧重点，法国学派受结构主义的影响，侧重社会深层结构分析，如特雷伊侧的《马克思主义与“原始”社会》、梅拉索克斯的《家族制共同体的理论》，分别阐释原始社会结构的连接关系和家族制的经济功能；戈德利耶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② 陈庆德：《经济人类学》，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展望》一文，主张把血缘关系引入唯物史观对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的认识中；以及他们把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当作一种世界性、普遍的生产方式的再认识，关于生产方式的多元存在和多样性发展（挑战斯大林五阶段模式）。美国学派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角度切入，侧重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马克斯·格拉克曼的《封闭的体系与开放的思想：社会人类学的素材局限》（1964）汇集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弗兰克的《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欠发达国》（1967）、《拉丁美洲：欠发达与革命》（1969），桑托斯的《依附的结构》（1970），桑克尔的《跨国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分裂》（1973），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贸易中的帝国主义研究》（1972），阿明的《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1976），论述了世界范围内由于资本主义霸权势力造成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与不平等的贸易和不平等的发展，以及造成的社会分裂。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1974）提出的“世界体系论”，即在资本主义之下，很自然就会产生出世界体系内的“核心”、“半边陲”和“边陲”三种等级，这个体系本质上是不平等的，存在着貌似公平的相对剥夺^①等等。这两个学派虽然各自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都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中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经济与政治诸权力的关系、经济关系中的剥夺、不平等与社会分裂、社会革命的关系等范畴。换言之，他们所研究的不属于传统西方经济学的“纯经济”问题，而是经济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

由上述可知，经济人类学中的制度分析理论范式的基本特征，是把研究方向聚焦于人与自然交换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并侧重于制度功能分析。这是一种有历史向度的、宏观的、跨文化比较的研究，不但与西方经

① 庄孔韶：《人类学通论》，115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济学有区别，与经济人类学的形式主义学派的形式理论范式及功能主义理论范式也有区别。

实在主义学派和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虽然都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共享制度分析理论范式，但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仍有一定的视域和方法上的差异。

就波朗尼与马克思的关系而言，他们二人都醉心于经济组织的一般共同特性和制度作用的分析，并在理论上达成了许多共识。二者的区别在于，波朗尼的写作处在一种要求他以非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掩盖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指向和政治氛围的背景中。^① 这样，波朗尼著作中包含的丰富理论和政治内容，其观点要比马克思含混得多。但相同的思想用不同术语表达，可称得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例如，波朗尼的“作为制度过程的经济”概念与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就具有极为相似的分析力。霍尔珀林指出：

“在一般性的最高层面上，跨文化的概念在制度模式中有一系列的作用。它们鉴别经济分析的关键单位如制度，也对在历史所有时代中和所有文化中的所有经济运行都至关重要的过程类型作出鉴别。它们也为比较和指出可以实施的经济变迁分析的方法提供引导。在一般性最高层面上的概念，包括马克思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以及波朗尼的‘实体经济’和‘作为制度过程的经济’。这些概念为制度模式奠定了基础。在此层面上的这些概念，也指出了一种具有解释相似性、差异性和经济过程变迁的潜能的理论视野。”^②

又如波朗尼强调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追求个人物质利益至上，由市场需求决定人的社会行为的经济形态，侵蚀了人

① 陈庆德：《经济人类学》，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② Halperin. R. H. 1988 *Economies across Cultures: Towards a Comparative science of the Economy*. 48—49.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